

4 文化 CULTURE

中国科学报

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 40 年 院士忆高考 ④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高考带我迈入“人生的春天”

■董家鸿



董家鸿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徐州医学院学习,1983年考取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肝胆外科科学家黄志强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美国外科协会荣誉院士、欧洲外科协会荣誉院士、国际消化外科学会(ISDS)执行委员会、国际消化肿瘤医师协会(IASG)外科分会主席、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肝胆移植学会继续教育培训委员会委员、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业作出选择是不现实的。比如,美国的医学生是在本科毕业生中招生,原因就在于大学毕业的青年三观才相对成熟。

随后,我向父母表达了想再考一年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报志愿的时候,父亲就动员我报医学院,他觉得当个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个高尚而神圣的职业,并且永远不会失业。

也许,这就是命运,就像中了父亲的“魔咒”一样,最终我被医学院录取了,算是圆了父亲的梦!

入学两年后,偶然听学校参加招生的老师说起当年招生的情景:当时,只要过了分数线的考生档案全部整齐地堆在一个大会议室的桌子上,各个高校的招生老师早就在外面等着。等到会议室门一开,那些高校招生老师都蜂拥到会议室“抢”档案,根本容不得按高考志愿去挑选。而我,就可能被徐州医学院的招生老师“抢”到手的。现在,我真感谢当年母校的招生老师,他是位体育老师,跑得快,将我抢到最适合我的医学殿堂。

还记得1978年春天,最后一次回燕尾镇中学办理离职手续,是父亲陪着我一起去的,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一起为我举办了一场庆祝和欢送晚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大酒,一场18岁的成年礼甚至都让我忘记了怎么回家的。等到第二天醒来,父亲还开玩笑地说,没想到他儿子的酒量那么大。

大二才真正“爱”上医学

1978年3月5日,是我大学报到的日子。父母提前准备好了行李,母亲为我做了一件当年非常流行的外套——可以拆洗的棉夹克。

恰好,我们县城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考上了徐州医学院,所以我俩正好同行。到了徐州医学院后,我有点小小失落,感觉校园就像个中学,一共有两栋教学楼、一栋办公楼、两栋宿舍楼、一个大饭堂,宿舍都是6人间的上下铺。然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徐州医学院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学府。

渐渐地,等同学们熟悉后,我才知道,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并没有选择医学,在全社会崇尚科学的氛围下,更多人还是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在当年,国家将医学和师范列为优先招生的专业。

记得有位同学酷爱数学,最后自学数学,在校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有的同学喜欢化学,最后毕业直接被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录取了。

我当时也非常喜欢数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都利用课余时间偷偷地去徐州师范大学旁听数学系的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课程。

而让我真正对医学感兴趣的是大二下学期,因为那时候学到了《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涉及人体机能学的课程,正是这些课程,让我领略了生命的奥妙和人体的精美,从此激发了探

索人体的兴趣和激情。我在大学遇到了一批学识渊博、热爱教学、授课水平一流的老师,接受了医学的启蒙教育。

记得当时解剖学的张凤真老师,他讲脊髓解剖的时候,双臂和双手在黑板上同时飞舞,一气呵成,瞬间就画出了一个脊髓的断面解剖图,这真是令人叫绝的教学艺术。他生动的课堂教学增加了我对解剖学的兴趣,也领略了人体解剖构筑之精妙。

赵昇浩老师将分子生物学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很艰深的问题讲得极为生动有趣,还编成口诀,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讲《外科学》总论的曾明老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麻醉学。他善于用数理逻辑和数学公式,用凝练的语言将令人费解的病理过程简约、明确地表达出来。直到现在,我都按照他教的办法来处理酸碱失衡、电解质紊乱等相关临床问题。也是因为是他,才让我对外科学和危重症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任孝衡老师是教《生物化学》的老师,他就像一位慈父一样,谦逊君子,温润如玉,对我们这些孩子循循善诱,既教给了我们医学知识,也同时渗透着做人的道理。

在学习上的勤奋,我得到老师们的欣赏,应生理教研室主任刘凝慧教授的邀请,我用大三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参加了她主持的微循环障碍课题研究。这些知识为我日后在临床上认识和处理危重症打下了一个较为扎实的知识功底。

其实,要感谢的老师还有很多很多,正是他们满腔热忱的付出,才让我们这帮如饥似渴的学子如沐春风,如逢甘露。

每堂课,我都非常用心,喜欢思考问题,课后去图书馆是我的“必修课”。很多知识点,也许老师只是在课堂上提了一句,但如果真想真正地弄明白,必须要去翻阅文献。我当时还节俭着省下钱来订阅了一本名为《生理学进展》的综合性杂志,主要了解一些生命科学的前沿理论和技术,这本杂志仿佛为我打开了又一扇窥视生命奥秘、人体美妙的窗口,每一期的文章都让我如痴如醉。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对生理生化和病理生理学中涉及的细胞学理论特别着迷,为了搞清楚受体如何将细胞外的信号传递到细胞内,并调控细

胞代谢和功能的机制,我去图书馆查阅了好多资料,分析、凝练受体和核受体的信号传导通路和相关分子家族。课后还与老师积极请教,最后没想到竟然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小综述,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这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其实,我的大学专业课考试成绩并不是特别冒尖,但我的自主性比较强,对教科书和老师课堂教学内容理解掌握后,还根据自己的兴趣分配很多空闲时间来阅读文献和专著。也正是那个时候,这种对知识的渴求,让我踏实地掌握了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意思维的方法。

在学习上,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将各门基础和临床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纵向串联起来,比如学到肝脏外科时,我就将有关肝脏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肝病内科学都复习一遍,并通过这些知识的融会贯通来认识肝脏病的发病机制,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原理和临床决策等。

也正是对科学知识的强烈渴望,让我萌生了考研究生的想法。后来,我们那一届,包括我在内共有四位同学在校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所以,我也非常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取研究生的医学本科生。

坦白地说,那时候上大学,我们的心都很静,读书很专注,丝毫不被外界所干扰。记得那时候我们教室距离居民区很近,校园外工地上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也并不影响我们全班同学的自习课。

除了专心学习,那时候我们也有不少课外娱乐活动,比如去看看电影,学习交谊舞、圆舞曲,参加歌咏比赛、大合唱、校运动会等。

感受医学的魅力与神圣

可以说,高考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很幸运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亲身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对教育的重视与期盼。

虽然当时误打误撞地进入医学院,但随着学习深入,我逐渐发现医学的魅力与神圣,学医也成就了我人生的三个梦想。系统的医学教育和培训使我成为一名医生,解决病人的疾苦,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同时也让我成长成为一名教师,给本科生、研究生带教,传道授业;还使我成为一名医学科学家,探索人体与疾病未知的秘密;革新医学的理论和实践。

有一句话叫“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从医35年之后,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真谛: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不仅需要你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高尚的职业操守,还需要你掌握科学人文、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知识。

曾经有人说,上帝保留创造生命的权利,但是却把照顾和维护生命的责任委派给了医生。或许,医生就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使,照顾生命,呵护健康。一个身患重疾的患者,经过我们医生的努力,从濒临死亡的状态,恢复了健康,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是一种幸运,对我们医生也是莫大的幸福。

如今,我虽然有各种学术和行政职务,也会各种事务缠身,但我仍然坚持工作在一线临床,每周看两个半天门诊,做两天手术,因为我没有忘记进入医学院曾经许下的诺言,救死扶伤是我的第一职责所在。

“科学的春天”吹绿了整个中国大地,带来了百花齐放,也让我有机会搭乘着高考这趟时代的列车驶向了“人生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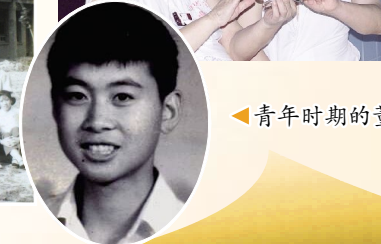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张思玮采访整理)



中学毕业合影,后排左五为董家鸿。



董家鸿(右)与老师黄志强院士(已故)探讨手术方案



青年时期的董家鸿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反思

■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学技术等哲学反思,找出造成生态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之道,以此为指导,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肖显静说。

反思,改变,是否就意味着退回伊甸园般的原始社会,抑或是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

在北京大学教授徐春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对工业文明的完全否定和遗弃,需要有继承与保存,更要有超越。“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靠工业社会已有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构建更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自然生产的循环过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善这种和谐机制。”

“技术对自然界,尤其是对生命的改造正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问题的本质是深层生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阳志认为,技术发明不仅要符

合科学规律,而且要符合人类生态学规律。

科学技术让人类变得强大,也让人类变得“不堪一击”。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叶平说,当今的环境问题,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过程中造成的问题。“科学总会伴有风险,正是要使科学不断完善起来,减少风险,我们应该确立科学技术的生态观和生态伦理道德。”“技术风险急剧增强的社会根源是穷追技术享受”,欧阳志远提出,具有社会属性的技术特别是高风险前沿技术,无论是做国家储备还是社会推广,要考虑3个问题:风险是否可以预测?技术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否可以控制?产生负面影响是否可逆转?科学需要质疑,技术也应当允许批判。在张阳志看来,科学与技术有必要分开理解,科学不光为技术开辟道路,更重要的是要解释技术的深层负面作用。“一门学科,尚未找到其科学基础之前,终归是一

种假设,所以科学有必要弄清楚技术的后果,摆脱技术绑架科学的局面。”

中国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国文指出,环境哲学不能只停留在思考的“神坛”之上,必须回归指导生态实践。

中国生态哲学脱胎于环境伦理学,发展至今将近40年,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以更好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中国生态哲学学者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向内溯源,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探寻当代生态哲学的意蕴,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已提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这些思想跨越时空,启迪着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缓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应对之策。

向外借鉴,诞生于西方的生态哲学以其系统化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我们需要基于中国国情,吸收内化并指导解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行动已经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未来,在拿出中国范式、贡献中国智慧,走向引领者的过程中,我们仍任重道远。”叶平说。

博物古今

隆冬时节,万木萧瑟,却总有植物能够不畏严寒、傲立风雪,“岁寒三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三友”之中,象征君子的竹颇得文人墨客赏识。

竹子属于被子植物中的禾本科竹亚科。说到禾本科,估计读者并不陌生,粮食作物中的水稻、小麦、玉米都是禾本科的,它们都不能像杨柳等树木那样明显变粗,所以不是木本植物,而是草本植物。竹子却不是一般的草本植物,不像小麦、玉米那样纤弱,有的竹子也像树木一样高大挺拔。

竹子的地下茎叫作竹鞭,上面有节,有芽从节上生出来,冒出地面,叫作竹笋。秋冬时节还没冒出地面的叫冬笋,春天冒出来的叫春笋,鲜嫩的笋是南方人非常喜欢的食材。春笋的生长明显受到雨水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快速发展的新生生物形容为“雨后春笋”,就是这个道理。

地上的竹子一节一节的,节与节之间的部分非常光滑。竹子的形态如此特别,非常容易识别。有一种昆虫叫竹节虫,你一看这个名字就可以猜到它们长什么样了。竹子的节上长出小枝,生长着狭长的叶子。四川峨眉山区有一种茶叶,叶片与竹叶相似,被叫作竹叶青茶。竹子的茎干和叶子都是翠绿的,有一种毒蛇,身材细长,体色也是翠绿的,叫作竹叶青蛇,在竹林里偶尔也会遇到它们。说到竹叶青,不得不提竹叶青酒。这可不是拿蛇泡的,而是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基础上加工出来的保健酒,其原料之一就是竹叶。

既然是绿色开花植物,竹子自然是能够开花的。但竹子却很少开花,不像很多植物那样年年开花。植物开花结果,主要是为了繁殖后代,但竹子可以通过竹鞭、竹笋无性繁殖,开花结果并非必需。只是在严重干旱等气候条件不好的时候,竹子才会开花结果。竹子的花并不起眼,一般是黄色、绿色或者白色的,而且会像小麦、水稻一样结穗,产生的种子叫作竹米,既可食用,又能入药。不过开花结果对于竹子的能量消耗非常大,一般会造造成竹子的死亡。中国特产哺乳动物大熊猫以竹子为主要食物,一听说竹子开花,国人总会担心大熊猫会挨饿。不过野生大熊猫自有其生存之道,人类不必过分担心了。

竹子的种类很多,分的比较仔细,有的却比较粗犷。竹编经常用到的慈竹、单竹,还有作为景观的从生的凤尾竹都是比较纤细的,直径都只有几厘米,可以用来做梁柱的毛竹、做水桶的巨龙竹都是比较粗壮的。西南地区的傣族用粗壮的竹子建造别致的竹楼,有些山区还将竹子劈开,作为引水的渠道。

除了上面提到的食用、建筑和日用材料外,竹子的用途还很多。中国古语很早就用竹子来记录文字,从商周到汉代,竹简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书写工具毛笔的笔管,大部分也是竹子做的。时至今日,在中国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还在用竹子来造纸。文具之外,竹子还被用作乐器,你看中国传统乐器笛、笙、箫、竽等,它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竹字头,这些都是用竹子做的乐器。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无丝竹之乱耳”,这是用丝竹指代各种乐器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非常喜欢竹子,在他们看来,竹子代表了正直的气节,是君子的象征。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都少不了竹子。宋代苏轼说得非常直白:“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文人咏颂竹子的诗句也很多,还有不少人喜欢画竹子。其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郑板桥了。郑板桥是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他擅长画竹,比较有名的画作有《墨竹图》《竹石图》等。他还写了好几首与竹子有关的诗,如他在《新竹》中说:“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既说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又说到了老少之间的传承与扶持。他在《竹石》中赞赞美的刚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出任山东潍县令的时候,郑板桥作诗赠赠他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体现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关注。

不难看出,竹子原产于中国,而竹文化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枝一叶总关情

■付蕾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资源的消耗与生态系统的破坏,这导致的生态危机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近日,在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面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学术会议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何鸣鸾的发言引人深思。

人应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然?万物是否平等?怎样利用好科学与技术这把“双刃剑”?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如何构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应如何与自然相处。

生态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一方面,我们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森林毁坏、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严峻挑战不只是某个具体对策能应对,而是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

清华大学教授卢风指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不同维度的变革,但最终是哲学与思想观念的改变。”

“我们需要对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和科

郑板桥《墨竹》